

传统与裂变：1938—1941年中条山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

张仰亮

提 要：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地处游击区的传统乡村社会造成了空前浩劫和深重灾难。在战争爆发前，中条山地区属于典型的传统乡村社会，不但信息闭塞、生活方式落后，而且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封建土地生产关系。然而战争波及后，由国民党主导的中条山根据地遭受了巨大的战争冲击和社会破坏，出现了社会恐慌、粮食奇缺和物资匮乏的境况，乡村危机凸显。在中条山根据地军政各方的努力推动下，民众运动日渐兴起，减租减息广泛推行，战地手工业得到畸形发展，使根据地的乡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不过，中条山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并非按照经济规律良性发展的，具有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非常态性的特征，并使其呈现出多元趋向的裂变。

关键词：中条山抗日根据地 乡村社会 变迁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地处游击区的传统乡村社会造成空前浩劫和深重灾难，并使其呈现出多元趋向的裂变。由国民党主导的中条山根据地初创于1938年三四月间，至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爆发，根据地基本沦落敌手，前后存在3年有余，其兴衰演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特殊性。学界对抗战期间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问题已作过较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并形成不少学术成果。^①但是，以往学界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多聚焦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却鲜有涉及。本文拟利用原始档案、时人回忆录、地方志以及报刊等资料对中条山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作一历史考察，试图揭示抗战背景下中条山根据地乡村社会变迁的大体历程和若干面相，以此折射中条山根据地建设的某些利弊得失及其与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异同之处。

一 战前中条山的乡村社会

中条山地处山西南部，背靠黄河，呈西南—东北走向，全长约160公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

* 本文受山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项目“国民党中条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项目编号：20143067）资助。在写作过程中，上海大学忻平教授给予了悉心指导，上海大学朱承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康健副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何伟楠博士等均对本文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一并表以谢忱，但文责自负。

① 据笔者所及，关于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李柏林对淮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作了考察，他认为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促使土地向中、贫农分散，阶级结构呈现由两极向中间流入的趋向，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参见李柏林：《减租减息与淮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李柏林另撰文指出，淮北抗日根据地通过减租减息，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参见李柏林：《减租减息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王元周对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疫病流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作了论述，他认为日军的侵略引起和加剧了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而1943年以后中共根据地在群众中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加强了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参见王元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疫病流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张文俊以晋绥边区西坪村为例考察革命乡村阶级结构与土地关系的嬗变，他指出抗战期间西坪村的富农阶层地位下降，贫农地位显著上升，且土地占有更加分散。参见张文俊：《革命乡村阶级结构与土地关系之嬗变——以晋绥边区西坪村为例》，《兰州学刊》2009年第10期。

之地。据曾驻扎于此的第三军副官处处长车学海回忆,中条山“山岭起伏,而山峪里村落棋布,田畴交错,在战略价值上,是黄河北岸的桥头堡……屏障了豫西以及陕东门户的潼关”^①。就中条山的地缘条件而言,其位于晋陕豫三省交汇地带,虽然是三省来往商旅常经之地,但由于山河阻隔,交通不便,所以商贸活动难言兴旺。下面就战争波及前中条山的乡村社会状况作一概述。

(一)旧有的土地生产关系较为盛行。在中日战争波及中条山前,作为山西传统产粮区的晋南,这里土地较为肥沃,盛产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农民世代以农耕为基业,辅之以棉纺等手工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方式较为普遍。中条山位于晋南腹地,因地形较为特殊,土地相对贫瘠,耕作不便,粮食往往收成不佳。因此,中条山“是一座地瘠民贫的穷山”^②。

在中条山地区,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封建土地生产关系。就中条山各县的阶级状况而言,自耕农所占比例最大,半自耕农次之,兼有佃农、雇农。如位于中条山北侧的解县、安邑两县,共有自耕农17014户、半自耕农4668户、佃农1265户、雇农1819户,其中自耕农占69%。具体而言,自耕农主要依靠耕种自家土地生产和生活,而半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则在不同程度上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计,纳租方式可以分为物租、钱租和分租3种。如在1935年前后,所谓钱租是指先交钱后种地,解县每亩交大洋2元,安邑县每亩交大洋2.5元;物租是指农作物收获后交付粮食,解县每亩交小麦4斗,安邑县每亩交小麦3斗;分租是指将收获物的三成交给地主。一般来说,地主将土地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农民需备厚礼,请保人,立租约,交押金,并经过特定的租借手续。与此同时,有些地主会保留少量良田雇人耕种,雇农以农耕为主,兼及炊事、放牧等杂项。^③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自耕农所占比例相对较小,而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以中条山南侧的平陆县寺头村为例。该村有86户人家、人口有660余人,共有土地19顷左右(1顷为100亩),其中高达8顷以上的土地归属于3户地主,全村一半以上的人口没有土地。^④对于多数依靠租种地主土地的半自耕农、佃农、雇农而言,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以至于“山里面过年才吃一顿玉蜀黍面的人家,并不在少数”^⑤。可见,在中条山地区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成分的状况并非完全一致,在不同的乡村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均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封建土地生产关系则当无异议。

(二)信息闭塞,生活方式较为落后。中条山因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向来与外界联系不畅,信息闭塞自不待言。如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中民众除参与协助军运外,“竟不知有抗战之举”^⑥。原第四集团军机要人员晋震梵就曾提到:“部队到时,群众惊愕,也不知抗战为何事,

① 参见车学海:《第三军战斗在中条山》,陈长捷、韩伯琴等著:《正面战场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73页。

② 《中条山将士战斗生活》,《中央日报》1940年9月13日,第2版。

③ 参见运城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运城城市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26页。

④ 参见冯诗云:《中条山里农民的“生活”》,《新华日报》1940年10月28日,第2版。

⑤ 冯诗云:《中条山里农民的“生活”》,《新华日报》1940年10月28日,第2版。

⑥ 《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视导人员选拔任用的有关文书及晋南战时教育实施计划》(1939年10月—1946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无)-13704。

与年长者交谈，竟说是中国与俄国人打仗。”^① 民众信息闭塞可见一斑。

就中条山地区的民风而言，“人民向极简朴”，又有着“性情顽固”的特点。^② 据晋震梵回忆，当地民众的一些民俗“不甚健康”，譬如无论男女老少，夏天多不穿上衣，“实有伤大雅”^③。对此，曾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供事的赵荣声对平陆县太宰村的民风有过较为形象的描述，或可对中条山地区的民风一窥。

这个太宰村处于丛山之中，只有很狭窄的小道与外面相通，一向十分闭塞。妇女梳髻的多，剪过发的少；裹小脚的多，天足的少；齐膝的褂子大襟上镶滚着很宽的多边花边，据说还保留唐朝遗风。因为这里山泉缺碘，又和外界隔绝，很多人患甲状腺大脖子病，没有得到治疗。^④

以婚俗为例，中条山地区的婚俗相当落后，早婚现象颇为流行。以安邑、解县为例，据《山西省民国10年人口统计》记载，安邑、解县男女结婚人数为1758人，其中15岁以下结婚者，男性21人，女性57人；16—20岁结婚者，男性250人，女性716人。^⑤ 驻扎在中条山西段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曾惊讶地描写道：中条山地区“有一恶习，男女早婚。女子十七八岁，男则十二三岁，关系人群体格、文化，均甚可惜”^⑥。婚俗是一地民风民俗的重要体现，通过对中条山婚俗的考察，不难窥见该地区的民风取向和生活水准，与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几无区别。

较之于婚俗的落后，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更令人咋舌。在第三十三军团军团长李默庵看来，中条山的农村“很落后”，民众多“不讲卫生”，当地妇女一辈子“只洗三次澡”，也就是出生、结婚、下葬各一次。^⑦ 晋震梵甚至认为中条山山内民众“风化迟开”，与外界交流甚少，“与山外相比几同隔世”，并举例称“村妇均发绀顶髻，钗环罗插，衣着红绿，袖宽盈尺，犹若戏装，观之甚觉离奇”^⑧。显而易见，在国民党军队（以下简称国民党军）驻地官兵眼里，中条山地区属于经济落后、信息闭塞之地，民众生活方式极为滞后。

中条山地区由于深居内陆，加之山河环绕，导致该地区与外界交流甚少。就土地生产关系、民众生活方式而言，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⑨ 总体看来，中条山地区的乡村社会有三大显著特点：首先是民众习惯于传统的土地生产关系，世代以农耕为基业，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较

① 晋震梵：《抗战中固守中条山的日日夜夜》，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91页。

② 参见《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视导人员选拔任用的有关文书及晋南战时教育实施计划》（1939年10月—1946年2月）。

③ 晋震梵：《抗战中固守中条山的日日夜夜》，《赵寿山将军》，第90页。

④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128—129页。

⑤ 参见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运城市志》，第71页。

⑥ 孙蔚如：《回忆录》，靳英辉、李长林：《孙蔚如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

⑦ 参见李默庵口述，刘育钢、高建中编写：《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11页。

⑧ 晋震梵：《抗战中固守中条山的日日夜夜》，第91页。

⑨ 参见张仰亮：《抗战期间国民党游击战的困境、因应与走向——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例》，《民国研究》2017年秋季号。

为普遍；其次是民风淳厚，甚至存在落后的民风民俗；再次是中条山地区的民众与外界交流甚少，对世界局势的变动、国家政局的走向知之甚少，视野狭窄。

虽然中条山的经济价值较为有限，但军事地位却异常重要。驻扎在中条山东段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对此有过较为客观的评价，称中条山“以言经济，因仅产煤、铜、硫磺等矿物，且人烟稀少，故价值并不很高。论军事地位，因其地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价值却很大”^①。以国民党军为主导的中条山根据地初创于1938年三四月间，根据地包括垣曲、夏县、翼城、绛县、闻喜、虞乡、晋城、阳城、沁水、芮城、平陆、永济、解县、安邑等地一部或全部。^②按照国民政府的战略安排，中条山根据地由第一、第二战区协力固守，军事归属于第一战区辖制，民政属于山西省政府管理，是“向华北采取攻势之支撑点”和“对日军后方游击作战之基地”^③。战争对中条山根据地的乡村社会造成空前浩劫和深重灾难，并对根据地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呈现出多元趋向的裂变。下面笔者着重从民众运动、减租减息、战地手工业等方面考察中条山根据地乡村社会变迁的若干侧面。

二 社会恐慌的蔓延与民众运动的日渐兴起

太原沦陷后，中日战争的战火很快波及晋南，使其迅速演变为战争重灾区。在中日军队反复争夺的中条山地区尤为惨烈，许多地方的粮食、器具、房屋等被日军“抢掠殆尽”^④。如位于中条山东段的垣曲县就破坏相当严重，不少“房屋被焚烧了”“埋藏的粮食被挖走了”，大街小巷的游兵散勇亦“任意为非作歹”^⑤。再如平陆县仅在1940年4月间就伤亡人口850余人，造成难民7300余人，焚毁房屋2400间，损失粮食2.8万余石，损失牲口2300余头。^⑥对于中条山根据地所遭受的战争破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感同身受，他在致蒋介石电函中直言：自抗战以来，晋南诸县首当其冲，“村落房屋农具耕牛食粮全被焚毁，兵灾之重，历来未有”^⑦。需要指出的是，日军所到之处对当地百姓极尽蹂躏，其罪行让人发指。晋震梵就曾提到：“敌人蹂躏过之六官村及其附近，满目疮痍，备极荒凉……被寇兵侮辱、强奸之妇女，甚至老妪，卧床不起者，亦屡见不鲜。”^⑧不难想见，中条山根据地一向为中日军队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长期处于拉锯战之中，受连绵不绝的战火影响，根据地的乡村早已破败不堪。

更为严重的是，民众对于突如其来的战争袭扰惊恐万分，社会恐慌问题日益严重。如在垣曲县，青壮年为躲避战祸，在一河之隔的河南省渑池县东北乡小学竟聚集了100余位20—30岁的垣曲籍“小学生”^⑨。再如，被战争洗劫后的芮城陌南镇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民众早已逃离，《大公报》记者周延描述：“二百余家店户的大镇，现在已荒芜不堪了，没有一个人，连狗

① 李云汉校阅，郭易堂、林泉记录：《刘茂恩先生访问记录》，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

② 参见李常宝：《1941年中条山根据地沦陷原因新论》，《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4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第53—54页。

④ 《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视导人员选拔任用的有关文书及晋南战时教育实施计划》（1939年10月—1946年2月）。

⑤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104页。

⑥ 冯诗云：《中条山里农民的“生活”》，《新华日报》1940年10月28日，第2版。

⑦ 《经济部关于卫司令长官请拨款办理晋南冀闻夏平等九县农贷及有关文书》（1940年1月—1940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社会部档案，档案号：11-（无）-2322。

⑧ 晋震梵：《抗战中固守中条山的日日夜夜》，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赵寿山将军》，第89—90页。

⑨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105页。

也找不到一条。到处看到的都是断瓦颓垣。”^①

为此，中条山根据地军政各方积极对当地民众开展心理安抚和政治动员，以应对社会恐慌问题，并争取民众支持抗战。如国民党军进驻中条山之初，卫立煌就赋予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政治动员的重任，一面将宣传布告贴遍远近乡村，对当地民众进行宣传、慰问和安抚，一面严禁国民党军侵犯民众利益，使民众能“安心回家生产，重建家园”^②。再如第四集团军在驻地附近“广泛向群众宣传抗日，演出抗日话剧……由于宣传队积极宣传鼓动，因而群情振奋，抗日情绪高涨”^③。国民党军的政治动员之举对拉近军民关系，消除军民之间的隔阂颇有助益，社会恐慌问题也得到一定的缓解。

值得注意的是，实受中共领导的牺盟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得到蓬勃发展，其组织触角逐渐延伸至整个晋省。^④ 牺盟会在群众工作方面直接借鉴了中共的工作理念和组织方式，他们认为进行全民族抗战，应动员全体民众，建立各种救亡组织，“依其自力的发展，协助政府抗战”^⑤。在中条山地区，由于不少县长对县职望而生畏，阎锡山不得不改派牺盟会特派员履职县长职位，如牺盟会特派员李涛、景思闵、王宿人、张呼晨、张培民分别担任夏县、闻喜、平陆、虞乡、垣曲的县长。^⑥ 在中条山各县，不论在偏远的乡村，还是在手工业工厂均普遍组织起农民、妇女、工人和青年等民众组织，如夏县中心区成立了晋南工人、农民、妇女和青年四大救国会。在时任第九十三军军长刘戡眼里，牺盟会掌握了山西的军事和政治，“他们完全代替了国民党的地位”^⑦。

中条山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也积极寻求与牺盟会建立联系，帮助其建立游击武装，以协同抗击日军。如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在中条山驻扎期间，“与山西新军、牺盟会、妇救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牺盟会、妇救会帮助部队联系群众，每逢战斗及时给部队传递情报，部队则送给他们枪支弹药，建立地方游击武装”^⑧。曾任第四集团军第四十六旅旅长的孔从洲就提到，当地群众在牺盟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宣传鼓动，侦察敌情，运送给养，安置伤员，“给予部队以极大的鼓舞和帮助”^⑨。对此，驻晋日军无奈地表示，所有的群众团体均“掌握在牺盟会的统辖之下”^⑩。可见，牺盟会成为维系中条山民众的重要纽带，在牺盟会的动员下中条山民众得以组织起来，形成了联结乡村的组织网络。

成立民众武装也是中条山根据地抗击日军的重要举措。1938年年初，山西省政府令各县的

① 周延：《中条山通讯虞乡解县视察记》，《大公报》1939年11月27日，第2版。

②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104页。

③ 晋震梵：《抗战中固守中条山的日日夜夜》，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赵寿山将军》，第92页。

④ 牺盟会，全称为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于1936年9月，其成立的历史背景极其复杂。概言之，既与日本侵略对晋绥的威胁以及蒋介石对阎锡山在山西统治势力的分化瓦解有关，又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运用分不开。参见王生甫、任惠媛：《牺盟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⑤ 王生甫、任惠媛：《牺盟会史》，第288页。

⑥ 参见柴泽民：《中条山十一年》，《革命回忆录》第17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⑦ 《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转发牺盟会组织与活动公函》（1939年6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40页。

⑧ 蒙定军：《抗战时期党在三十八军的工作》，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赵寿山将军》，第184页。

⑨ 孔从洲：《平陆抗敌记》，陈长捷、韩伯琴等著：《正面战场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24—225页。

⑩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3页。

武装自卫队、警察改编为游击支队，协助正规军队“普遍发动游击战”^①。在此形势下，中条山各县的民众武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组织规模大小不一，并几易其名，大体经历了人民武装自卫队、抗日游击队、武装自卫总队和政治保卫总队等阶段。《申报》曾对中条山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民众运动作了相关报道，称：“少壮的加入自卫队，妇女和老翁，在隆隆的大炮声下，若无其事的在做田工，小孩子加入了村里的民族小学……因为群众的抗日战争，古老中国变成青年了。”^②

事实上，除了国民党当局、牺盟会组织的民众团体及民众武装外，中条山民众也自发组织了形式不一的民众团体和民众武装。特别是在国民党军与日军对峙的犬牙交错地带，民众武装发展较快，“势力最大的是红枪会”^③。随着日军进逼至晋南后，红枪会在中条山地区普遍建立起来。红枪会，又名红学会、小红学、大红学等，大体可以分为白山（善）堂、黑道门、乾门、坎门和乾头会5个道门。至于成立红枪会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信神”，而是“保卫家乡”^④。当然，红枪会在中条山之所以迅速发展起来，也与民众“无以为生”不无关系，因为民众“莫不疲于奔命，恨痛万分”，“又觉得依靠军队和政府，均不能解除痛苦”，所以一般目的均为“保身，保家，保国”^⑤。红枪会发展迅速，及至1939年，在中条山两侧共有会员8万余人。^⑥1939年4月15日，《大公报》就曾评论道：在晋南的游击区，“民众不能想出自卫方法，红枪会使春笋般地生长着”^⑦。可见，在抗战大背景下民众自发组织的武装已较为普遍。

三 粮食危机的加重与减租减息的广泛推行

战争使中条山根据地原本就存在的田地荒芜问题更加严重。据晋省当局于1939年12月调查得知，晋南12县的地亩总数为6142636亩，其中荒地有144420亩，且“大半在中条山里”^⑧。笔者认为，粮食总产量之所以出现大幅度下滑，应与民众大量逃亡导致田地荒芜问题加重关系密切。如1939年安邑、解县共有99198人，较之1938年减少了51847人。^⑨《大公报》记者白朗曾对中条山的土地荒芜问题作过报道，称有些村庄“老百姓完全逃光，虽然不久敌人就退去，但老百姓仍然不敢回来”“田园荒芜了，田野里满是未除的杂草，我们靠田吃饭的农户何以为生呢”^⑩？同时，日军还对中条山根据地的粮食进行毁坏和抢夺，如在“六六战役”期间，日军就曾以“三光”手段“大肆纵火烧毁田间成熟小麦”^⑪。田地的荒芜以及农作物的毁坏，促使粮食危机日益严重。

其实，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驻也有意无意加剧了中条山根据地的粮食危机。由于中条山是一条石山，耕地有限，而十几万国民党军蜂拥而至后，“需用浩繁”，粮食“终不敷用”，出现军队

① 阎锡山：《第二战区二年来抗战工作报告与检讨》，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秘书处印，1939年，第18页。

② 《斗争中的晋南——政治·经济·文化·民运》上，《申报》1939年3月13日，第3版。

③ 金在镛：《中条山的民众武装》，《申报》1939年4月20日，第3版。

④ 以群：《中条山漫记——晋南的红枪会》，《华商报》1941年6月3日，第3版。

⑤ 梦回：《散布在晋南的民间武装组织——九宫八卦道崛起及现状》，《申报》1938年10月19日，第3版。

⑥ 金在镛：《晋南前线的红学会》（上），《申报》1939年6月9日，第3版。

⑦ 本报特讯：《晋南前线》，《大公报》1939年4月15日，第2版。

⑧ 冯诗云：《中条山里农民的“生活”》，《新华日报》1940年10月28日，第2版。

⑨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运城市志》，第55页。

⑩ 白朗：《我们是走向前方——中条亲记之一》上，《大公报》1939年12月23日，第4版。

⑪ 晋震梵：《抗战中固守中条山的日日夜夜》，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赵寿山将军》，第94页。

争抢民食的情况。^①对此，军委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就曾提到：“军民争食，全家自杀者有之，逃向沦陷区亦有之。”^②此外，由于中条山根据地机关林立，各行政机关往往巧立名目征收各种税款，形成“不合理负担”，曾任第三军军长的曾万钟不无埋怨地表示：“民众对你们行政主任、县长的感情坏透了。”^③如临近中条山的猗氏县赋税征收就异常混乱，除地方政权常常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外，驻地国民党军也肆无忌惮的强取豪夺，国民党猗氏县委书记王成林就曾对该县的征收乱象专门上报：

县长王海清大派款项，勒索人民。自后又有三五师刘子祥部到境内驻扎。强为各村派款，借名帮助军饷，大村四五千，小村一二千不等。一六五师许景祥亦到境内游击，同样向各村强派款项，大致与刘部同，又有暂编第一师张致忠虽未向村中派款，大致拉票借款，皆此部所为。人民先遣队刘子珍、岳俊借名中央胡宗南部下，亦为勒索情事。^④

毫无疑问，粮食危机的加剧对中条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极为不利，致使民众生活陷入破产边缘。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民党军政各方对民众无节制的摊派，军民之间产生了疏离感，“民众极嫌弃之”^⑤。对于游击区日益严峻的粮食危机，国民政府相继出台新政以纾解民困，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减免租税。1939年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游击区的田赋及附加税皆减至原来的50%，佃租亦不超过佃农实际收入的20%。^⑥上行下效，山西省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纾民困”，一方面令军队和民众团体“不得自行征收”，一方面田赋征实，“执行减租减息”^⑦。

牺盟会在中条山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旗下的农救会成为具体实施者。牺盟会认为：“必须逐渐减租减息，减轻民众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然后才能动员更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战。”^⑧如1938年7月，垣曲县农救会制定了《垣曲县减租减息暂行章程》，又发布了《告全县农民书》，号召民众向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广泛开展，农民的清债、清租纠纷骤然增加，垣曲县农救会干部甚至直接驻村办理。据称，从1938年冬到1939年共处理清债、清租纠纷高达1440件，全县共计减租1.25万余石（折合400多万市斤），另减去贷款利息1.25万银元。^⑨可见，通过减租减息运动，民众的

① 参见洛阳通讯：《中条山将士战斗生活》，《中央日报》1940年9月13日，第2版。

②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1941年3月13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4册，第59页。

③ 秋江：《全面游击的山西——晋南的政治和军队政治工作》，《大公报》1938年7月13日，第5版。

④ 《军统局关于晋猗氏县敌伪动态情报的文书》（1940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1-3314。

⑤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1938年8月6日，第354页。

⑥ 参见《战地党政委员会抄送战区减免土地租税及补救耕地荒废暂行办法草案函》（1939年6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97页。

⑦ 《国民党第二战区经济委员会1940年工作报告关于财金事项》（1941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654—655页。

⑧ 王生甫、任惠媛：《牺盟会史》，第289页。

⑨ 参见杨圣清、段玉林：《巍巍中条——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史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经济负担有所降低。与此同时，乡村的阶层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动，下面以解县、安邑两县为例进行分析。

表 1 1935—1941 年解县、安邑县农民构成表

年份	自耕农	半自耕农	佃农	雇农
1935 年	17014 户	4668 户	1265 户	1819 户
1940 年	18310 户	2244 户	650 户	—
1941 年	18196 户	2224 户	784 户	—

资料来源：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运城市志》，第 126 页

通过表 1 可知，较之于全面抗战前，解县、安邑两县的农民总数有所减少，应与民众逃亡和参军入伍有关。两县自耕农的数量得到一定增加，在全面抗战前的 1935 年自耕农占比 69%，及至 1940 年、1941 年分别达到 86%、85%。同时，佃农、半自耕农的数量锐减。表明在减租减息运动下，不少半自耕农、佃农和雇农从地主手里得到一定的土地，转化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显而易见，减租减息运动非但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也对乡村阶层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即使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但在战火摧残下农业的收成究竟如何呢？下面以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解县、安邑两县夏秋两季的代表性农作物小麦、高粱为例进行对比分析。

表 2 1936 年、1939 年解县、安邑主要农作物产量调查表

县名	年份	小麦		高粱	
		总产量	每亩平均量	总产量	每亩平均量
解县	1936	263858 石	1.35 石	3760 石	0.94 石
	1939	15000 石	5 斗	50 石	5 斗
安邑	1936	493174 石	1.20 石	1728 石	2.16 石
	1939	120000 石	5 斗	1500 石	1 石

资料来源：《山西省各县主要农作物调查表》（1939 年），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B13—2—89；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运城市志》，第 132 页

如表 2 所示，1939 年解县、安邑两县的小麦、高粱两种农作物较之于 1936 年非但总产量大幅度下滑，而且亩产量也下跌不少。其中，作为民众主要口粮的小麦总产量、亩产量的下滑幅度尤为惊人，如在全面抗战前解县的小麦总产量为 263858 石，亩产量为 1.35 石，至 1939 年总产量、亩产量分别骤降至 15000 石、5 斗，总产量不及战前的 6 成，亩产量尚不及战前的 4 成。另如在全面抗战前安邑县的小麦总产量为 493174 石，亩产量为 1.20 石，至全面抗战开始后的 1939 年两者分别骤降至 12 万石、5 斗，总产量尚不及战前的 3 成，亩产量不及战前的 5 成。从中不难看出，战争对中条山根据地农作物的收成产生了较大的破坏性影响，导致农民的粮食收成大幅度下降。那么，中条山根据地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呢？下面以战争破坏较为严重的沁水县 1940 年情况为例作一分析。

表 3 1940 年山西省沁水县农民生活概况一览表

类 别 \ 状 况	户数或人数	全年收入约数	今年支出约数	全年盈余约数
地主	90 户	12000 元	8000 元	盈 4000 元
自耕农	8800 户	1370000 元	1380000 元	盈 10000 元
佃农	160 户	7680 元	8880 元	亏 1200 元
雇农	140 户	4200 元	6700 元	亏 2500 元

资料来源：《山西省党部各县农村概况调查表及有关文书》（1940 年 6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社会部档案，11—1—9771

如表 3 所示，地主作为土地集中拥有者盈余较为丰厚，每户平均盈余约 44.4 元，农民主要阶层的自耕农略有盈余，每户平均盈余约 1.1 元，而佃农、雇农则处于亏欠状态，每户分别亏欠 7.5 元、17.9 元。可见，除人数占比较少的佃农、雇农生活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外，占人数绝对多数的自耕农尚且收支相抵，甚至略有结余。因此，笔者认为即使战争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但通过减租减息运动，中条山根据地的多数农民尚可以勉强维持生计。

不过，由于中条山常年处于战火笼罩之下，灾难常常不期而至，生活极不稳定。1939 年 8 月作者战地访问团考察中条山后，有团员特别报道山西农民生活的艰辛应居“全国之冠”，“他们经常地穿着褴褛的衣服，住的是破草房和窑洞，终年吃不到一块肉”^①。以受灾最重的垣曲为例，由于“中国军队和日军往来拉锯，老百姓不能按时种地，只有吃树皮草根，饿死一些人”^②。所以，学者对中条山根据地民众的温饱问题绝对不可高估。

四 物资匮乏的加剧与战地手工业的畸形发展

至中条山战役爆发前，日军先后向中条山根据地发起 13 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至于小规模的战斗，几乎“无日无之”^③，战争的破坏和军队的驻扎加剧了根据地物资匮乏的问题。据芮城县马家庄村民马振山回忆，在六六战役期间，“日本人进村后把老百姓的牛都捅吃了，还把驴都拉走，驮他们抢的东西和弹药等东西”^④。可见，中条山根据地创建后遭受了巨大的战争冲击和社会破坏，根据地的民众饱尝日军的蹂躏和战火的洗礼，使本就地瘠民贫的中条山乡村雪上加霜。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对占领区的民众极尽勒索，厉行经济统制，并对中条山根据地进行军事封锁。1938 年 7 月《申报》就提到，晋南各县春麦收成颇佳，日军为削弱国民党军的战力，在附近村庄“大肆搜刮，所至之地，屋舍为墟，景况极为凄惨”^⑤。同时，日军在晋南各县“大量收买棉花粮食，向平津输送”，以断绝国民党军的棉花粮食来源。^⑥尤其是在 1939 年 11 月以后，日军为阻止国民党军下山采购粮食，遂将中条山各山口严密封锁。另外，日军在晋南占领区极力

① 白朗：《我们十四个（日记）》，上海杂志公司，1940 年，第 143 页。

②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 106 页。

③ 车学海：《第三军战斗在中条山》，陈长捷、韩伯琴等著：《正面战场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74 页。

④ 被采访人：张振山；时年：78 岁；采访地点：西安；采访时间：2009 年 3 月 16 日；采访人：张恒。参见张恒：《黄河魂——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2011 年，第 105 页。

⑤ 《晋南春麦丰收惜被日军搜刮》，《申报》1938 年 7 月 4 日，第 4 版。

⑥ 参见《晋南日军收买棉花粮食》，《申报》1940 年 3 月 22 日，第 3 版。

操纵物价，并贬低法币价值。日军在晋南中心城市运城设立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晋南各县成立了合作社作为推广伪钞的发行机关，“即同一物品，值伪币一元者，如以法币购之，则增加一倍有余”。在闻喜县售卖的食盐，“伪票一元可买六斤”，而“法币一元仅买二斤二两”。夏县亦是如此，自1939年起日军在夏县推行伪币后，“法币一元在该县仅值伪币四、五角”。^① 不难想见，日本属于小国，依靠自身资源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几无可能，日军为支撑战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对日占区厉行经济统治，并对中条山根据地进行军事封锁，使得根据地的物资匮乏问题更加凸显。

此外，中条山根据地受战争破坏、部队进驻等多重因素影响，以致物价飙升。在平陆县茅津镇，在战前1元可买10余斤面粉，战后紧俏时1元仅能买1斤面粉，上涨10余倍；白糖在战前每两仅1毫，现时每斤需1元6角。^② 令人称奇的是，经过战火洗礼的茅津竟呈现出“畸形繁荣”的景象，据周延称：“虽然经过‘六六’的大焚烧，但现在生意倒还算兴隆。过去大规模的饭馆七家，现在已增三家，共为十家。”^③ 显然，茅津等少数交通枢纽之所以出现“畸形繁荣”的现象，应与战争导致的军民大规模迁移有关。

为应对物资匮乏的困局，中条山根据地在黄河沿岸设立了运输站，用于从后方转运物资。如此一来，根据地的物资多由兵站供给，辅之以“山里购买”和下山“采办”^④。如第四集团军在尖坪渡、茅津渡设立运输站，第五集团军在白浪渡设立运输站，第十四集团军在垣曲县城附近的渡口设立运输站，尤其是垣曲成为“晋东南的交通枢纽和总后方”^⑤。国民党军的军需物资多来源于陕西和豫西。但是，在战争年代渡河运送物资并非易事，既要躲避日军的空袭，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等待通行。如在垣曲县城附近的渡口，有人中午抵达渡口，“过了黄河已经黑了”^⑥。相较于渡河的艰难，将渡运过河的物资运往国民党军前线更为不易。如第五集团军设在白浪渡的运输站与前线部队相距120里，来往物资一般由士兵及当地民众运送，由于路途不便，正常天气下“往返需要两天多”，若遇到刮风下雨“就要背三四天才背一回”^⑦。虽然中条山根据地多数生活用品依靠后方转运接济，但由于驻军云集，生活用品所需甚巨，以至于“供不应求”^⑧。所以，设立运输站并不能完全解决中条山根据地物资匮乏的问题。

为进一步应对前线军民日用品匮乏的困境，国民政府于1938年开始推行工业化合作运动。^⑨ 当然，国民政府推行工业化合作运动的原因甚为复杂，如应对战争带来的经济结构解体问题，又

① 参见《国民党第二战区经济委员会陕晋各县财政金融调查报告》（1941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647—649页。

② 参见《斗争中中的晋南——政治·经济·文化·民运》（上），《申报》1939年3月13日，第3版。

③ 周延：《中条山通讯虞乡解县视察记》，《大公报》1939年11月28日，第2版。

④ 洛阳通讯：《中条山将士战斗生活》，《中央日报》1940年9月13日，第2版。

⑤ 岳寿椿：《第四十三军参加中条山抗战的概况》，陈长捷、韩伯琴等著：《正面战场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309页。

⑥ 王梅：《渡黄河》，《中央日报》1940年6月15日，第4版。

⑦ 公秉藩：《第三十四师在中条山抗战纪实》，陈长捷、韩伯琴等著：《正面战场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84页。

⑧ 周延：《中条山的手工业——中条山通讯之一》，《大公报》1940年2月15日，第3版。

⑨ 据石岛纪之记述，工业化合作运动是新西兰人利维·阿利等所设想的，在海外得到好评，便因此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1938年8月在陕西省宝鸡成立了第一个炼铁合作社以后，工业合作社得到急速发展。在高峰时期的1941年达到1858个，社员数达到3.5万人。参见〔日〕石岛纪之著，郑玉纯等译校：《中国抗日战争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8页。

如抵制日军经济统治、军事封锁带来的物资匮乏问题，不一而足。由于工业化合作社具有适合游击战、可移动的特点，备受国民政府的青睐。^①一般而言，工业化合作社分为3种形态：一是设在游击区的战区合作社；二是设在介于战区和大后方之间的中型合作社；三是设在大后方的大型合作社。^②

1939年间，中国工业化合作协会在晋东南设立事务所，负责发放贷款，收取到期贷款，并对中条山的各类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当地的小手工业可以向该事务所“贷款”“组织各种手工业合作社”^③。此后，在奇岩叠壑的中条山相继成立了各类手工业合作社，主要涉及造纸、棉纺、丝绸、皮革、机械、采掘冶金和药材等战地急需的手工业部门。至1940年年底，在中条山地区已有“工业合作社六十所”^④，著名者如垣曲冶金合作社、沁水纺织合作社、夏县脉岔造纸厂、平陆涧阳工賑作业（制衣）厂、阳城后河造纸合作社等。下面以夏县脉岔造纸厂、平陆涧阳工賑作业（制衣）厂和煤炭开采业为例进行个案分析。

夏县脉岔造纸厂。由于中条山根据地机关林立，出版物较多，对纸张需求量尤大，以致根据地出现严重的纸荒。在1939年7月，由国民政府賑济委员会筹集资金在夏县设立脉岔造纸厂，注册资金1000元，隐藏于中条山内。造纸厂雇佣经理、协理各1人，工头2人，工人10人，工人平均每月工资10元，工头15元，另有盈利分配，“以百分之三十为基金，百分之四十为救济金，百分之三十为工友奖金”。造纸厂的产量较为客观，平均每月造纸1200刀（每刀100张），每刀售价6角，每月销售额为720元。造纸厂所生产的纸张全部售给当地的机关和部队，虽然无法完全解决中条山根据地的纸荒难题，却“可以救济一部分的了”^⑤。

平陆县涧阳工賑作业（制衣）厂。1939年6月，意在缓解中条山根据地的缺衣难题，由国民政府賑济委员会下发资金3000元在平陆设立工賑作业厂，简称制衣厂。制衣厂分纺织和缝纫两个部门，每个部门又分为厂内工人和厂外工人，主要业务为“代缝外界所需的服装”。据统计，制衣厂厂内工人有10人，每人月工资15或16元，厂外工人50余人，其工资为计件工资或计量工资。比较而言，制衣厂所生产的衣服价格较为便宜，在洛阳售价22元的粗布棉衣，在制衣厂仅需15或16元。从工厂效益来看，制衣厂营业6个月里，总收入达到“四千九百余元”，总支出为“四千二百余元”，尚有结余。^⑥

煤炭开采业。中条山蕴藏有数量可观的煤炭，开采区域多集中在翼城、夏县、垣曲、平陆等地，尤以日军侵扰较少的中条山南侧为多。据周延粗略估计，至1940年，中条山有大小煤矿60家，且90%以上的煤矿为私人投资，官办煤矿仅3家，资本均在3000元左右，每个煤矿工人仅20人上下。但各个煤矿的生产技术较为落后，均为“土法开采”。煤炭的价格也较为低廉，在煤矿附近“四角钱可以买到一百斤”，远些的地方“一块钱也可以买到一百斤”，产煤只供给中条山军民使用。^⑦

在抗战大背景下，中条山根据地的战地手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甚至一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不可否认的是，根据地的战地手工业对支撑根据地抗战、满足根据地军民所需有

① 参见〔日〕石岛纪之著，郑玉纯等译校：《中国抗日战争史》，第87—88页。

② 参见〔日〕石岛纪之著，郑玉纯等译校：《中国抗日战争史》，第88页。

③ 《山西民运通讯》（1940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社会部档案，档案号：11-1-3440。

④ 《晋冀两省游击区合作运动甚发达——晋南设工业合作社六十所》，《申报》1940年12月16日，第3版。

⑤ 周延：《中条山的手工业——中条山通讯之一》，《大公报》1940年2月15日，第3版。

⑥ 参见周延：《中条山的手工业——中条山通讯之一》，《大公报》1940年2月15日，第3版。

⑦ 参见周延：《中条山的经济战》，《大公报》1940年9月17日，第2版。

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对于工业合作社之于游击战的作用,《申报》就曾指出,“此项小规模生产事业”,不但是“维持游击战之经济利器”,而且可以“补充都会区域生产之不足”^①。

结 语

日本侵华战争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入侵程度最深、侵略地域范围最广的一次外族入侵战争”^②。中条山根据地作为中日双方军事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对根据地乡村社会造成空前浩劫和深重灾难。抗战军兴,中条山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无疑是适应抗战需要的,对巩固根据地与抗击日军均大有裨益,从而使得根据地坚持3年有余。同样,战争也使传统乡村社会呈现出多元趋向的裂变,诸如民众运动的日渐兴起、减租减息的广泛推行、战地手工业的畸形发展。诚如费正清、赖肖尔所言:“中国为了能在日本自1937年以来的侵略面前生存下来,已在主要的战争行动中耗尽了全力。”^③应该看到的是,中条山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是在日军入侵背景下出现的,实受外力影响,有着特殊的时代烙印,并非根据地的内生事物。因而,中条山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并非按照经济规律良性发展的,具有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非常态性的特征。

让人费解的是,国民党军在1941年中条山战役中遭遇惨败,根据地几乎丢失殆尽。事实上,中条山根据地丢失的原因颇为复杂,诸如客观原因为日军准备充分、武器精良等,主观原因为国民党军决策失误、战前轻敌等。^④但是,国民党在改造传统乡村社会过程中的缺失问题亦值得深思,比如对民众运动一以贯之的防范心理就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晋西事变”对中条山根据地的民众运动影响甚大,事变后牺盟会逐渐淡出中条山,民众运动主导权被国民党所取代。^⑤国民党山西省第五区指导专员办事处就曾指出,之前“各县人民团体,亦为牺盟会所把持”,“晋东南各县政权突变后,近复变为中央政权”^⑥。应该看到的是在国民党指导下的民众运动日渐消沉,不复当年之兴盛,对中条山抗战的支持力度大为减弱。虽然国民党在改造中条山根据地乡村社会过程中有意借鉴了中共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模式,甚至直接由牺盟会推行减租减息和开展民众运动,明显具有中共的作风。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党并未完全融入中条山乡村社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存在着防范心理,也未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国民政府军委会在中条山战役后认为,由于政治工作“不力”“民众离心”,最后“反为敌用”^⑦。由此看来,抗战期间国民党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并不彻底,明显影响了其对日作战。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责编:詹利萍

① 重庆十四日哈瓦斯电:《晋冀两省游击区合作运动甚发达——晋南设工业合作社六十所》,《申报》1940年12月16日,第3版。

② 参见忻平:《灾难与转折:1937》,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③ [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31页。

④ 参见张仰亮:《国民党军事高层在中条山战役前的案略因应》,《历史教学》2018年第4期。

⑤ 参见张仰亮、李常宝:《1938—1941年中条山抗日根据地民众运动考察》,《山西档案》2015年第2期。

⑥ 《山西省民运通讯》(1939年12月—1940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社会部档案,档案号:11-2-3440。

⑦ 《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及陈述意见书(1941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